

主 编 黄晓勇

DOXUE DA JIANGTANG

笃学大

第一辑

讲堂

笃学大讲堂

传统文化中的几个问题 王蒙 中国说唱艺术的魅力 姜昆 冯远征的艺术人生 冯远征 故宫学与故宫学思潮 郑欣淼
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 单霁翔 发现·理论·眼界 李学勤 活下去——走来的农庄 高宏 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
〔日〕西原春夫 中美经济前景分析 〔美〕罗伯特·卜若柏 中美关系和我 国未来国际安全环境 彭光谦
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经验 〔俄〕季塔连科 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 唐双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篤學大講堂
第一輯

篤學大講堂

DUXUE DA JIANGTANG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丛

主 编 黄晓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笃学大讲堂. 第1辑 / 黄晓勇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丛)
ISBN 978-7-5097-3960-0

I. ①笃… II. ①黄…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0359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丛 ·

笃学大讲堂 (第一辑)

主 编 / 黄晓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高 雁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瑞芬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1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彩插印张 / 0.5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363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097-3960-0

定 价 / 6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演化成一场对全球未来战略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革命，机制要素重组，中国经济正面临洗牌和结构性战略转型，并由此进入了继续由发展主导的机遇和挑战凸显的新时期。时代要求中国思想和东方智慧必须再次集结出发，寻找由科学发展观引领的转变中国发展方式之路。

2011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顺利迁至良乡新校园。为了让广大师生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进一步丰富同学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促进我院与良乡大学城其他兄弟院校的友好交流，在我院党委的支持下，我们以社会面临的重大学术课题、经济热点问题等为切入点，策划举办了新校园落成典礼之“社科大师大讲堂”系列讲座活动，以期引领全校师生的思想，并对社会意识产生一定影响。

该活动以“治学·社会·人生”为主题，王蒙、李学勤、西原春夫、姜昆、彭光谦、季塔连科、郑欣淼、唐双宁、单霁翔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先后作为应邀嘉宾来我院做精彩演讲，演讲主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艺术等诸多领域。嘉宾们的讲座风格迥异，却都基于深厚的专业功底，辅以自己的感悟，厚积而薄发，坦诚地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谈论学术、剖析社会，还是畅谈人生，都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广大师生、员工呈上了一场场深邃广博的思想盛宴。

广大听众在讲座过程中认真聆听，在互动环节积极发言，对不解的地方虚心求教，对怀疑的问题大胆直陈，充分彰显了研究生院“笃学、慎思”的严谨治学风貌。

“社科大师大讲堂”成效显著，对提升我院新校园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精神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得到了我院领导、广大师生的一致肯定和广泛好评。为了保存大讲堂的完整意义,我院决定将大讲堂所有的讲座文稿整理成集纳入此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社科大师大讲堂”本辑共十二讲,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讲: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以“传统文化中的几个问题”为题,从泛道德论、泛哲学论以及泛相对主义论三个方面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出路。

第二讲: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以“发现·理论·眼界”为题,阐明了发现、理论和眼界对于治学的重要作用,其中发现是契机,理论是基础,眼界则是治学深度与广度的保证。

第三讲:日本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著名学者西原春夫先生以“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成立区域性国际组织”为题,以欧共体的形成和作用为分析案例,强调亚洲成立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亚洲各国目前所面临的任务。

第四讲:著名农民画家高宏先生以“活下去——走来的农庄”为题,展开了一幅扎根于黄土高原的陕北农民粗糙坚韧的生活画卷,通过对“饥饿、活着、承受、希望”的解读,再现了自己对生命、生活的体验及人性的种种理解。

第五讲:中国曲艺家协会原党组书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先生以“中国说唱艺术的魅力”为题,介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来龙去脉,充分展现了中国说唱艺术的巨大魅力。同时他不无担忧地指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曲艺艺术的发展遇到了新时期的考验。

第六讲:北美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罗伯特·卜若柏先生以“中美经济前景分析”为题,从能源经济、中美关系、金融危机等方面,对比分析了中美改革的共同点、金融危机对于经济改革的影响以及中美应对策略等问题,强调了中美两国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第七讲:著名演员冯远征先生以“冯远征的艺术人生”为题,通过分享本人的从艺历程,指出无论是在哪个行业,只有不断地努力,不轻言放弃,并以从容淡泊的心态去看待成败得失,才能走得更远。

第八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少将、著名军事战略研究专家彭光谦先生以“中美关系和我国未来国际安全环境”为题,从实力、意图和行动三个维度对挑战我国国际安全的因素进行评估,着重分析了中美之间复杂微

妙的双边关系对我国国际安全所造成的长期影响，并得出结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既斗争又合作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双方应积极努力以实现中美关系的软着陆。

第九讲：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先生以“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经验”为题，客观分析了苏联解体的种种原因，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并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卓越成就为例，反证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同时论证这并不意味着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崩溃。

第十讲：时任文化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郑欣淼先生以“故宫学与新国学思潮”为题，首先论述了国学研究的重要性，继而从国学思潮与故宫学的产生、国学的学术使命与故宫学的学术价值等方面解读了故宫学与新国学思潮的相得益彰，强调了故宫学这门新学科的学术责任和历史使命。

第十一讲：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唐双宁先生以“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为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形势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接着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努力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是中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良方。

第十二讲，文化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以“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为题，深入地总结、分析了我国城市文化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还阐述了故宫博物院宏伟的未来发展规划。

为方便读者阅读，成书时略作调整，分成三篇，分别是“文化与艺术”“治学与人生”及“中国与世界”。其中，“文化与艺术”涵盖第一讲、第五讲、第七讲、第十讲及第十二讲；“治学与人生”涵盖第二讲、第四讲；“中国与世界”涵盖第三讲、第六讲、第八讲、第九讲及第十一讲。

本辑“笃学大讲堂”所收录文稿起自2011年4月25日，止于2012年5月15日，历时约一整年。本书的出版恰如“社科大师大讲堂”（现名“笃学大讲堂”）的周年献礼，为这次活动的阶段性收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黄晓勇

2012年6月25日

目 录

文化与艺术

传统文化中的几个问题	王 蒙 / 003
中国说唱艺术的魅力	姜 昆 / 019
冯远征的艺术人生	冯远征 / 043
故宫学与新国学思潮	郑欣森 / 069
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	单霁翔 / 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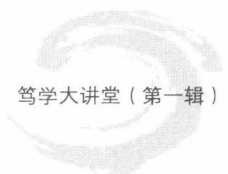
治学与人生

发现·理论·眼界	李学勤 / 145
活下去	
——走来的农庄	高 宏 / 167

中国与世界

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

——成立区域性国际组织	〔日〕西原春夫 / 183
中美经济前景分析	〔美〕罗伯特·卜若柏 / 200
中美关系和我国未来国际安全环境	彭光谦 / 254
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经验	〔俄〕季塔连科 / 278
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	唐双宁 / 301
后 记	/ 325



笃学大讲堂（第一辑）

文化与艺术

传统文化中的几个问题

王 蒙

主持人 黄晓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大家上午好，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在这书香浓郁、满眼青绿的大好时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也迎来了创建新校区后的首次学术盛典——新校园落成典礼之“社科大师大讲堂”。本次大讲堂以治学、社会、人生为主题，我们盛情邀请了多位国内国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业界名人前来讲学。希望通过聆听他们讲述的新锐的思想观点、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们大家在思想上能够受到启迪，在治学为人方面能够获得收获。

今天，新校园落成典礼之“社科大师大讲堂”在这里拉开帷幕。首堂讲座，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享誉中外的知名作家、学者王蒙先生。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不仅以其性格刚毅著称，还以其经历坎坷而闻名，七十七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创作成果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长篇小说七部、中篇短篇微型小说几十余部、古典研究文学著作两部、旧体诗集一卷、新诗集两卷。王蒙先生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创作极为丰富的作家，而且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的作家。王蒙先生的语言集睿智、精辟、幽默为一体，其作品不仅在国内影响广泛，还被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先后获得过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王蒙先生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化活动策划家和文化使者，曾参与策划和组织的许多重大的文化活动影响深远，为传播中华文化、为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更为令人敬重的是，在社会发展与变迁十分迅速的今天，王蒙先生仍然坚持读书、坚持思考、坚持写作，十分重视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也强调文化交流与

融汇，从未停止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与思考。王蒙先生拥有丰富的生活积淀、渊博的知识积累、深厚的文化修养，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独到的领悟，其视野之开阔、理解之深刻无疑是我辈努力追赶而难以望其项背的。王蒙先生认为，中国在吸收大量民主、科学、社会进步等思想观念后，更应该珍惜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美好的内容，这将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将为中国长远的改革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氛围。

在得知王蒙先生将要莅临我们研究生院讲课后，社科院有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我们周边兄弟院校的师生员工、房山区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纷纷赶来，一睹大师风采。我们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蒙先生为我们讲解《传统文化中的几个问题》。

王蒙（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大家好，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个即将正式落成的崭新的社科院研究生院跟大家就一些有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种荣幸。但是，我确实也非常惶恐，因为我的特点跟各位不一样，我既缺少科班的学问训练，也没有一个很严谨、缜密的学术功底，即兴的、闲谈式的东西多，所以一到我这我得先声明，我谈的是“山寨版”的传统文化。不过这个也有根据，礼失而求诸野，传统文化也可以“山寨”地研究研究。我是业余地探究传统文化，我的主业是写小说，不过传统文化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词——小说家言。小说家言就是稗官野史、引车卖浆之流的一些说法，跟那些很一板一眼的说法不完全一样，是野路子的或者叫赤脚的。

我谈传统文化中的几个问题，是因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谈法我也掌握不全，有的是以儒家为正宗来谈，有的是以儒道互补来谈，有的则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来谈中国的文化。我过去也曾经很喜欢把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来谈传统文化，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从整个传统文化中找几个有趣的问题和大家讨论，一是关于泛道德论或者简称为泛善论，一是泛哲学论或者称之为泛道论，还有一个姑且称之为泛相对主义，或者称之为泛易论。

第一，我先讲泛道德论。中国很早就有一个说法，“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因为中国崇信这种一元化的权力结构，统治的合法性就在于你是有德者，你在道德上要可以成为人民的表率。我在一些书里面，更喜欢用的词是“民人”。为什么我不说人民而说“民人”呢？因为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这个词差不多是解放区的专利，意识形态性非常强。国民党那边是讲国民，日语里



面也不用人民而用国民，到市里叫市民，到县里叫县民，人民是共产党的词，相信先秦诸子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意识形态的概念。当然若是让大学问家来研究，“人”和“民”这两个词意思还不一样，“民”是小老百姓，“人”是奴隶主。统治者必须要成为“民人”道德上的表率。统治里面不仅包含行政的管理，还包含教化。这种道德至上的论点被孔子大大强化了，孔子要在不可能完全平等的人际关系中树立一个道德的规范，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论点再往后发展下去，就是以德治国。来这之前，我一直想找“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句话最早出自哪里，结果查了半天，发现最早是《三国演义》中说的。但是类似的意思很多，早到《吕氏春秋》就已经有这种说法。这种观点的意思是说天子、皇权的合法性和他的道德表率、道德修养以及道德境界有关。这种说法很高明，而且不容易做到。这种观点在给了封建统治者以统治合法性的同时，又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极大的压力。因为道德上，你是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的。你可以说我能做到 GDP 每年提升百分之几，或者说我要整顿社会秩序，这些都说好。但是说到我要做大家道德上的表率，这个就很难了，因为道德是不好衡量的。所以这种不完全能做到的成为道德表率的要求，既可能成为统治者为自己的权力作打扮的一个外衣，也可能成为老百姓批评统治者的一个根由。最近，我看到有关意大利总理的一些报道，若在中国，他可能早就被轰走了，被轰下台了，送去一年半劳教都有可能，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物。所以不完全能够实现的道德表率的要求，在客观上成为对中国的封建皇权的一种文化监督，一种道德压力。我们不是常说，中国的权力缺少监督、缺少压力吗？这个压力有，就是这种道德上的要求。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你的统治是以你的道德上的制高点为合法性的，而你道德上老是达不到这个制高点，就会成为“民人”对你谴责、不满甚至成为某些乱世英雄想取而代之的最重要的理由。这样，我们看到传统文化里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君臣观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要求绝对的忠心。要愚忠，绝对没有聪明的忠、智慧的忠，一智慧他就忠不到哪儿去。另一个比较厉害的方面，那就是“无道昏君”，一旦被扣上“无道昏君”的帽子就危险了，有道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你是无道昏君的时候，“民人”就要把你给革命掉。比如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中国有很多在这方面的很厉害的话语。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是天生的吗？你也不是天生的。秦始皇出巡，项羽看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看见了，则说“大丈夫当如是也”。

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儒家的那一套是失败的，他说历代的帝王都批评秦始皇，实际上做事学的都是秦始皇那一套。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个提法，叫做“评法批儒”，历代的帝王在中国搞政治统治，在中国掌权，要实行法家那一套，那个时候的法家思想跟我们现在说的注意法治（rule by law）和法制（law system）含义不同。中国的法家侧重研究权力，研究驭民之术，就是如何保持权力，如何使用权力，如何巩固权力，如何防止权力的流失等。毛主席这样讲，是事实，就是有道理的，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既然是泛道德主义的，提倡以德治国，因此就认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按照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进行统治的。不是！尤其到后期不是，明朝和清朝都不是，你看看《金瓶梅》中有几个是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再看看《红楼梦》，除了一个贾政口头上仁义道德实际啥事都办不成以外，有几个是反映儒家（思想）的？儒家在中国已经很大地受挫折了，可现在还有人误以为只要让小学生都穿上汉服，然后在那朗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以为念念这个，再念一念《弟子规》，中国一切就能秩序井然了。做梦，白日之梦也！

但是，我们仍然要极其重视泛道德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信这个。真正的权力持有者不肯完全违背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老百姓对这个非常重视。作为权力的持有者不但在掌握权力时要讲道德，什么时候都要讲道德。陈世美和秦香莲的关系问题，这里头不必讨论他们的感情如何，也不用讨论两人之间的性的吸引力是否和谐，按照中国人的道德观，陈世美就是杀妻灭子，就是没有基本道德的坏人，可以说，儒家的这一套对人民的影响是深入人心的，是不能够轻视、不能够小看的。五四搞得再激烈，再伟大，最后人民——尤其是农村百姓，他们仍然坚信道德友善是第一位，我们常讲的德才兼备也得以德为先。

为什么有了道德就有了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绝。绝在哪儿呢？绝在它认为这种道德是宇宙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色。道德是谁制定的？是圣人制定的。圣人是根据什么制定的？是根据宇宙，尤其是根据天和地制定的。它不仅把道德提高到政治的、权力的或者是人际关系的规范的最高境界，而且把道德说成是宇宙，是天与地的最基本的、最可贵的特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本身就是君子，就是君子的表率，君子自强不息，这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文化象征。“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多么有担当，无论多少压力都一概接受，偶尔地震一回那是因为人



干了坏事，古代中国每发生一次地震，皇帝都要下罪己诏，来表示由于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不好，道德表率做得不够，得罪了老天爷。我们把道德寓于对天地的尊敬和信仰之中，这就在某种意义上把道德的信条信仰化了，造就了一个崇高的、超人间的原则。这不仅是人间的鼎则，而且是天地的意志。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多么有道德，有大美而不说，不自我吹嘘，天地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真正成为人间表率的，就是天和地。只有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他看来，天地不讲什么道德，有些时候甚至是冷酷无情的。即使如此，老子也讲“上善若水”，就是认为水本身载有大道，具有道德性，能给人道德感，“利万物而不争”。孟子说“人之向善，如水之向下”，他们都是从大自然中来体会道德精髓的。老子还说过“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这也是讲天地的美德。

老子还讲到“天之道如张弓乎”。正像拉弓一样，他说天之道是损有余以奉不足，一个人在各方面所获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消费需要的时候，就应该从他身上往下减少，以便帮助一些弱势群体。可是老子说，人之道道德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就是说，人间的情况是：越是不足的，就越要受到剥削、压迫，用你的不足去伺候有余的他人。他强调人之道与天相反，损不足以奉有余，什么意思呢，地主老财不正如此吗？损喜儿、损杨白劳以奉黄世仁。喜儿和杨白劳本来是不足的，本来是弱势的，结果却越是遭到压榨。所以在中国，一方面有不可动摇的君权，一方面又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而且农民起义的口号就叫做“替天行道”，就是要杀富济贫或是劫富助贫。农民起义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弱势的穷人占了多数，把这些人号召起来，见着有钱的人就杀，之后把他的金银珠宝一分，以此来动员起义。所以关于以天地为道德表率的说法，既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理论，其中也蕴藏着中国数千年来的内在逻辑性。

这种泛道德主义存在需要一个前提——人基本上是性善的，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如果好好调动人本性中的善良成分，比如说，感恩、敬老、爱幼等美德，这个社会就不仅不会出现问题，还会有父慈子孝、君明臣贤、夫妻恩爱的良好局面。这种观念和西方人对政治、对社会的理解不一样，西方人虽不说性善性恶，但更多的时候是从性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倾向于认为人是自私的，人是有贪欲的，因此需要很多的规范，特别是制定很多的法律来

将人约束。20世纪90年代出过一本书叫《总统是靠不住的》，介绍了美国人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观念。该书的中心思想是，总统也是靠不住的，哪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和争夺，因此强调严密的律法的重要性。

我还想专门谈一下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中国由来已久，孔子早就提倡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当然，对于中庸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解释是，中庸不是中间路线的意思，而是恰到好处，不要过分，也不要不足。类似中庸的思想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均有所体现，他们认为中点是最美的。中庸在革命的过程中曾被误解，大家嘲笑中庸，谁要是中庸，谁就是不革命、不进步、不敢于担待。甚至认为，中庸就是不阴不阳、不男不女、不前不后，是对社会、对国家、对集体不负责任的假装老好人的无能和窝囊行为。但是我们想一想，在中国为什么中庸之道讲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里面有些想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国外的政治学最基本的命题是多元制衡。因为人性存有恶的一面，所以各种各样的权力，包含行政的权力、立法的权力、司法的权力等多种权力在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得到控制。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国没有多元制衡的这种传统，如果有的话，今天中国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国家。顺便说一下，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中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是一个大国，当时统治的人口多于同时期欧洲和美洲的人口总和。如果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的人口至少应该分成五十多个国家，但是中国实行的是集中的统一管理，而且这种管理颇有成效，根据费正清先生的研究，秦朝开始设立郡县制，县的数量在那时达到两千多个，而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全国的县也是两千两百多个，我估计我国现在的县和县级市的规模也是两千多个。费正清据此认为这个数字就是集中、统一的集权式政治管理的上限。此后即使县的人口不断增加，县的数量却没有太大的上调。这是很有趣的说法。美国的很多关于政治和管理的观念，中国人并不接受，也很难让中国人接受，因为当中国人管着两千多个县，管着比欧美全部人口还多的人口的时候，美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一观点被基辛格所接受，基辛格多次讲这个问题。今年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前夕，基辛格又发表了一篇大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集中管理的一套办法。中国之所以没有分裂，里面有很多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汉字，即使我国方言很多，却有统一的文字，我相信这个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否则广东话、温州话和北京话的差别不见得会比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小。还有人说，中



国不容分裂是出于水利建设的需要，中国的黄河、长江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这些观点，都不是我能够把握的，希望待会儿我讲完后，大家给我指教一二。

中国的权力是绝对的集权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历史上，有频繁的农民战争和改朝换代。除了我前面所说的文化监督和道德监督，中国还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习惯，更有反对奸佞之臣，称赞忠心之臣的价值观。那么中国的平衡是如何实现的呢？有趣的是，中国政治上的平衡不是依靠共时性的制衡，而是在时间的纵轴上实现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氏孤儿的故事正是如此，一开始赵氏一家人是很厉害的，赵盾弑其君，有弑君之力可见其权威之盛。但是后来遭小人陷害，被屠岸贾所取代。屠岸贾大肆追杀赵家人，赵家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孩都差点保不住。幸亏程婴等拼死相救，赵家孤儿才得以存活。这个故事惊天动地，经伏尔泰改编后曾在法国上演，歌德也喜欢这个故事，也曾改编过，故事发展到后期，赵氏孤儿成长起来，几经努力，把屠岸家族给压了下去。在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情况下，一个人做事留有余地，勿为己甚，就成为很可贵的一个道德，因为现在你逞一时之强，他日可能会遭到报复。在现在的中国，我们常说一个人厚道，哪怕他傻，越傻越好。另外一个人很聪明，可他刻薄，大家都不喜欢。中国提倡老成持重，林语堂说过中国人最喜欢的是老成持重。说某人少年老成是极高的评价，这人只有三十岁样子看起来却有五十多岁。我时常琢磨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老成持重，而不喜欢青春万岁，不喜欢冒冒失失。就是因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你若想获得一个“河东”加一个“河西”的经验，读“河东”“河西”两期的研究生，学业有成至少需要六十年。我现在七十七了，我基本上算是期满了。一个人如果只有三十二岁，这个时候他的学问中只有“河东”的经验，没有“河西”的经验，他就是片面的。这种逻辑的结果是政治更青睐于内敛的、不过多说话的人，中国人多半是能做到这点的。

但是一味强调中庸，也会掩盖许多真实的想法，带来很多弊端。现在的情况是，大家先不考虑事情中的是非、曲直、真伪，我们先讲这人态度怎么样。你说得很好，说的都是真话，可我不喜欢。你来一个半真半假，大家却都爱听。这样注重人际关系的结果会演变成情义第一，而后发展成情面第一。道德评价虽然是一个崇高的理念，但是非常不具体。我是一个不爱较劲的人，但是我自个跟自个较劲，直到现在七十七岁，还没有解决掉这么一个问题：

关公的义到底对还是不对？这实在令我惶恐。关公既忠又义，是忠义的象征。时下，处处供奉关公，尤其你们到海外去，海外华人开饭馆的、卖古玩的供的都是关公，而不是孔子。关公义字当头，义就是讲交情，老百姓需要的是交情，需要的是义气，皇上需要的是忠心。但是义字层面的道德难以具体化，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情面。看了曹操败走华容道和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之后，从感情上讲，我喜欢曹操不喜欢关公。道德本身也包含了矛盾，有时忠义不能两全，有时忠孝不能两全，有时候也有为了某种道德而牺牲另一种道德的残酷做法，但是在老百姓眼中，最重要的还是情面。我去过台湾三次，有一次回来在凤凰台遇到梁文道，梁文道跟我说，台湾人民最得意他们是有情有义之人，鹿港小镇的生意人最重情义，台湾人的情义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原来和陈水扁关系好的人，什么时候都说陈水扁的好话，无论有多少证据证明陈水扁有贪污、洗钱、非法转移财产等犯罪行为。我看《红楼梦》的时候，有一个感兴趣的环节，王夫人房间里头丢了玫瑰露，彩霞偷的，但彩霞受赵姨娘压迫才偷的，然后玫瑰露又被贾宝玉当浓缩冷饮给喝了。尽管王夫人很生气，贾府也着手在查，但这事牵涉较广，情节复杂，不好深究，因为若是真的追究起来，一些人的面子上过不去，所谓投鼠忌器。到了后来，当贾宝玉出来替彩霞顶罪的时候，彩霞又羞愧难当，主动坦白，并表示愿意承担任何后果，最后，大家有感于彩霞的真诚和勇气，非但没有责备，反而是皆大欢喜。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偷了东西，轻易就被原谅，想必西方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奥妙。

第二个我要讲的问题是泛哲学的问题。

中国人喜欢整合，喜欢找根，认为万事万物有一个统一的按钮，可以称为泛通论。中国人还喜欢搞文字崇拜和概念崇拜。光一个“道”字，就不得了，什么都可以称为“道”。用老子的话说，不仅物质是一个“道”，精神也是一个“道”，这完全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道”既是万物的法则和规律，又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道之为物，唯恍唯忽”，道既是物质，也是精神，找到这个“道”，就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孔子也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到了孔子的学生一代，则变成“夫子之道，忠信而已”。中国人热衷于寻求一个“概念神”。神本来就是一个概念，现在宗教神学方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概念神变成了人格神，神被赋予了很多人的特点。比如说，基督耶稣实有其人，耶稣的爸爸约翰和妈妈玛利亚也都是实有其人，但耶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上帝的儿子。可是上帝是没有形象的，我们无论是到